

論凌曉樓先生之學術特色

李幸長*

摘要

凌曉樓曾經先後問治學之法於包世臣、問《四書》之學於李兆洛、問何休《公羊》之學於劉逢祿，又曾問鄭氏《禮》於沈欽韓。凌曉樓繼承了劉逢祿《春秋公羊何氏釋例》的主要觀點，卻與沈欽韓以說《春秋》專以《左氏》為主的學說大相逕庭。此為清代學術中今文、古文師法不同的痕跡。

張舜徽《清儒學記·揚州學記》的結論中，歸納出六點揚州學派的優良學風；分別是一、對待學術問題，採取求同存異的態度。二、運用變化、發展的觀點分析事物。三、推廣了求知的領域。四、突破了傳、注重圍。五、不從事聲氣標榜。六、肯承認自己短處。並總論揚州學派學者的治學態度與其學術之成就，以「圓通廣大」四字為評論。本文一方面據此脈絡以論曉樓之學術特色、一方面探討曉樓傳世的九種經學論著，觀其學行與學風。在過程中發現曉樓作品中《禮說》、《禮論》、《禮論略鈔》三種，應是同一本書，最後的定稿是《蜚雲閣叢書》所收錄的《禮論略鈔》。

本文最後提出凌曉樓先生之學術特色可從下列幾個方向瞭解：一、漸為西京之學。二、「禮者治人之律，而《春秋》則其例也」—援禮釋《公羊》、引《公羊》以證禮。三、「今文經去古未遠」--強調《白虎通》、《風俗通》、《列女傳》、《淮南子》等典籍的參考價值。四、以《經》、《注》、《疏》博證群經的態度說經。五、純粹儒家經師角色的認定。

關鍵詞：凌曙、凌曉樓、揚州學派、蜚雲閣叢書

*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本文為 89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獎助成果報告書，計劃編號 NSC89-2411-H-241-002。

On the Academic Features of Mr. Ling Xiao-lou

Lee shang-chang*

Summary

Mr. Ling Xiao-lou Once has asked scholarship method to Mr. Bao Shi-Chen and consult about 「Four Books」 Scholarship from Mr. Li Zhao-luo. To consult about Mr. Hu-ghs 「Gong-Yang」 scholarship in Mr. Liu Feng-lu To consult about 「Zheng-Shi Li」 to Mr. Shen Chin-Han. Mr. Ling Xiao-Lou inherited the main points of Mr. Liu Feng-lu 《Explanation Example about mr.Hos Gong-Yang scholarship》 But Mr. Ling Xiao-Lous Academic advocate is different from Mr. Shen Chin-Hans Academic advocate. Mr. Shen Chin-Han advocate that Chun-Qoi designed to Tso-zi based. This new text in the Qing Dynasty academic, classical imitating different traces.

On the Academic Features of Mr. Ling Xiao-lou With 「tactand majority of」 to comment. On the one hand, in the context of this article accordingly Academic Features of Mr. Ling Xiao-lou Discussion on the another hand according to Mr. Ling Xiao-lou handed writing nin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View their learning and Atmosphere.

Keyword : Mr. Ling Su 、 Mr. Ling Xiao-lou 、 Yangzhou school 、 Fei-Yun-Ge Series of books

* Doctor of Letters,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I-Shou University

壹、清乾嘉學者凌曙曉樓先生經學著述探討

清代學術以乾嘉樸學為代表，乾嘉樸學中，又以吳、皖二派學者引領學術發展。其中吳派惠棟世傳經學¹，主張「唯漢是從」言「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²。而皖派戴震通過訓詁等方法，探求六經蘊含的義理³，主張通經以明道，言「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⁴。

基本上，吳、皖二派學者的治學態度，都在實踐清初大儒顧炎武「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⁵的主張，以直接訓詁古代經典的手段，企圖避開宋、明儒空疏之蔽。然而，乾嘉盛世學術主流的吳、皖二派學者，在小學上取得空前的成就，卻也漸漸有狹隘之失。近代學者張舜徽在《清代揚州學記》一書中，總結乾、嘉學風，他說：

余嘗考論清代學術，以為吳學最專、徽學最精，而揚州之學最通。無吳、皖二派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通學，則清學不能大。…揚州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專精匯為通學。

張氏以揚州學派學者⁶，由專精進而發展為會通，彌補了吳、皖二派的固守漢儒、偏頗橫議等缺失，達到清代學術創新與通大的新高峰。揚州學派儼然成為乾嘉樸學由訓詁、考據之學，

¹ 惠棟（1697年—1758年），清初經學家，吳派經學的代表人物。字定宇，號松崖。江蘇元和（今江蘇蘇州吳縣）人。惠棟祖父惠周惕、父惠士奇，皆治《易經》，三世傳治，讚為一代佳話。《四庫提要》評惠棟，「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九，經部，春秋類。）——引自《維基百科—惠棟》。

² 惠棟〈九經古義序〉。

³ 戴震創立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以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此外，他也精通訓詁學，晚年所著《孟子字義疏證》則是其一生哲學思考的總結品。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批駁了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念，他指出，「舉凡民之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為人慾之甚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理也、公義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程朱的「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誠見夫詭辭邪說之深入人心，必害於事，害於政，天下披其禍而莫之能覺也。」戴震並指責程朱「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胡適說「戴震是反抗這種排斥人慾的禮教的第一個人」。——引自《維基百科—戴震》。

⁴ 《戴東原先生集》，〈古經解鈎沈序〉。

⁵ 《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

⁶ 楊晉龍〈臺灣學者研究「清乾嘉揚州學派」〉述揚州學派學者，依其出生早晚及學派興盛狀況可分為：第一期：賈田祖（1714-1777）、李惇（1734-1784）、任大椿（1738-1789）、汪中（1744-1794）、王念孫（1744-1832）、劉台拱（1751-1805）、朱彬（1753-1834）等；第二期為：凌廷堪（1755-1809）、秦恩復（1760-1843）、鍾懷（1761-1805）、江藩（1761-1830）、焦循（1763-1820）、阮元（1764-1849）、王引之（1766-1834）、李鍾泗（1771-1809）、黃承吉（1771-1824）、凌曙（1775-1829）、劉寶樹（1777-1839）、徐復、汪光燾、宋綿初（1777年貢生）、楊大壯、許珩等；第三期有：焦廷琥（1783-1821）、汪喜孫（1786-1847）、薛傳均（1788-1829）、劉文淇（1789-1854）、劉寶楠（1791-1855）、阮福（1802-？）、梅毓（1821-1850年間舉人）等；衰落期為：成蓉鏡（成孺，1816-1883）、劉毓崧（1818-1867）、劉恭冕（1824-1883）、劉壽曾（1838-1882）等 34 人。涉及這些學者的相關研究均屬揚州學派範疇。

走上義理、致用之學的橋樑，終於與常州今文學派，共同推衍出晚清《公羊》學者今文經學的改革浪潮。為通經致用的傳統學術，畫下句點。

揚州學派以乾、嘉、道、咸時期的揚州⁷學者為中心，一方面承惠棟、戴震漢學之餘緒，一方面發展出揚州學者全新的面貌。如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的訓詁成就⁸，承戴震之學又青出於藍。江都汪中⁹，以先秦諸子學的重新詮釋開新局面。焦循¹⁰經學思想的力倡獨立思考，以免於為漢儒窠臼所陷。凌廷堪¹¹之復禮思想，以及以阮元為主導的「以禮代理」之崇禮思潮¹²，開始以漢、宋兼採的局面，回歸儒學義理之路。

道光晚期，追隨阮元的一群揚州學者，如劉文淇、毓松父子、劉寶楠、恭冕父子、羅士琳、陳立、柳興恩等人，立志各治一經，成為晚清十三經新疏之學，堪稱為揚州學派總結並創發乾、嘉樸學的總成績。其中劉文淇父子四代一經，共著《左傳舊注疏證》¹³，傳為美談、陳立¹⁴著《公羊禮疏》被譽為漢代董仲舒之後的《公羊》集大成的傑作。劉文淇與陳立

⁷領有高郵州、泰州、江都、甘泉、儀徵、寶應、興化、東臺等二州六縣。

⁸王念孫生於乾隆九年（1744年），早年從學於戴震，花費10年時間，搜集漢魏以前的古訓，詳加考證，寫成《廣雅疏證》，為訓詁學研究貢獻頗大。道光十二年（1832年）卒。著有《廣雅疏證》、《釋大》、《讀書雜誌》、《王石臞先生文集》。其子王引之繼承王念孫的音韻、文字、訓詁之學，謹遵「訓詁之旨，存乎聲音」，曾自言：「吾著書不喜放其辭，第一事就本事說之，栗然止，不溢一辭之也。」其書札短篇，後人輯為《王文簡公文集》。著作有《經傳釋詞》、《經義述聞》三十二卷。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人稱「高郵二王」，又與戴震、段玉裁稱為「段戴二王之學」。阮元《學經室續集》卷二《王石臞先生墓志銘》稱：「高郵王氏一家之學，海內無匹。」

⁹汪中（1745年—1794年），原名秉中，字容甫，號頌父。揚州人。七歲喪父，家貧，由其母鄒氏授《小學》、《四書》。十四歲入書店當學徒，遍覽經史百家，故揚州民間云「無書不讀是汪中」，工駢文，特出於當世。著有《述學》內外篇、《春秋述義》、《春秋後傳》、《廣陵通典》、《荀卿子通傳》、《小學》等。

¹⁰焦循（1763年—1820年），字理堂，一字里堂，揚州府甘泉縣（今揚州邗江黃珏縣）人。以孟子及周易研究見著。焦循之治學可分為三個時期：學算期、治《易》期、習《孟》期。嘉慶十八年（1813年），焦循完成《易通釋》十二卷。翌年，復提其要為《易圖略》、《易章句》。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以此三書合刊為《雕菰樓易學三書》。嘉慶九年（1804年），又仿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之體例，著有《論語通釋》十二篇，以闡發《論語》忠恕之理。又有《孟子正義》草稿三十卷。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焦循病歿，未及完成《孟子正義》之謄校工作。由其子焦廷琥續校《孟子正義》。道光元年（1821年）二月，廷琥亦以病終。最後，於道光五年（1825年），終由焦循之弟焦徵將《孟子正義》付梓印行，兩代三人合著一經。

¹¹凌廷堪（1757年—1809年），字次仲，又號仲子先生，安徽歙縣人。清代經學家、音律學家。精於戴震之學，提出「以禮代理」的理念。嘉慶十四年（1809年）卒，年五十三。《清史稿》有傳。撰有《禮經釋例》十三卷、《燕樂考原》、《校禮堂文集》、《元遺山先生年譜》等。

¹²凌廷堪提出「以禮代理」，阮元的〈性命說〉與〈仁論〉，成為新義理觀在乾嘉時期變化的內在邏輯，嚐試用實理與經驗來取代宋儒的玄理，以群體的道德要求替代個人倫理的重視。

¹³劉文淇字孟瞻，清江蘇儀徵人。嘉慶優貢生。致力於左氏，撰《左傳舊注疏證》，遍輯賈、服、鄭三家之注及近人補注，而以己意疏通證明之，未成書而卒。子毓松（松崖）、孫壽曾（恭甫）、曾孫劉師培（申叔、左盒），世傳其學，稱「青谿舊屋劉氏經學」。五世傳經，著述包含《左傳舊疏考正》、《左著舊注疏證》及劉師培《春秋左傳》等相關著述。

¹⁴陳立（1809年—1869年），字卓人，又字默齋。江蘇句容人。清代經學家，以研究公羊學聞名。少客揚州師事凌曙，凌曙晚年臥病，劉文淇代授陳立經學、小學，於《公羊傳》用功最深。積三十年

之學，俱出於江都凌曙。

凌曙字曉樓，在揚州學派中，以熟於《三禮》、長於《公羊》之學著稱。以經為師、自學成家，其治學態度與思想，並未直接受惠棟、戴震學術影響。曾在阮元幕中擔任校經¹⁵、塾師¹⁶等職。著有《公羊禮疏》、《公羊問答》、《公羊禮說》、《春秋繁露注》、《群書答問》、《禮論略鈔》、《四書典故覈》、《儀禮禮服通釋》等書，在揚州學派中獨樹一格。

本論文以〈論凌曉樓先生之學術特色〉為題，希望透過對凌氏學術的解讀，進一步整理揚州學派的學術風格、與治學方法，呈現揚州學派之學術成就與價值。同時也可以探討清代學術中，由吳、皖漢學轉變為義理與通經致用之學的微妙關係；並藉由凌曉樓獨特的融《公羊》學與《三禮》學於一爐的《春秋公羊》禮學，觀察其對晚清的今文學運動，與群經《公羊》化的種種影響。

凌曉樓生於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年），乾、嘉樸學盛行之後，同時學者如包世臣¹⁷、阮元¹⁸、劉逢祿¹⁹、沈欽韓²⁰等學者，皆深受惠、戴治學方法影響，曉樓雖與之交往，卻因自學成名、兼之一生以經師自視，故與乾嘉樸學淵源不深。要深入瞭解曉樓學術，尤其經學思想，惟有直接從曉樓的著作著手一途。曉樓之著作由其外甥劉文淇集為《蜚雲閣凌氏叢

之力著有《公羊義疏》76卷。其他著作有《白虎通疏證》12卷、《爾雅舊注》2卷、《說文諧聲孳生述》3卷及《句溪雜著》6卷。

¹⁵據洪梧〈春秋繁露注序〉，仁宗嘉慶十四年己巳（1809年）曉樓三十五歲，由明經赴舉京兆，隨即於嘉慶十五年從游阮侍郎之門，佐集經籍。又據《阮元年譜》，阮元於嘉慶九年四月，於浙江巡撫幕中手訂《十三經經郭》體例分纂。嘉慶十五年曉樓入都為阮氏校輯《經郭》，因盡見魏、晉以來諸家《春秋》說。

¹⁶據包世臣〈十九弟季懷學詩識小錄序〉及《阮元年譜》，阮元於嘉慶二十二年調任兩廣總督，嘉慶二十三年戊寅（1818年）凌曉樓年四十四歲自都入粵，阮元延曉樓課其子阮福賜卿號喜齋。

¹⁷包世臣字慎伯、倦翁、號安吳先生，乾隆乙未--咸豐癸丑（或曰咸豐乙卯），安徽涇縣人。嘉慶戊辰舉人，官江西新喻知縣。先生於農禮刑兵、河漕鹽政，博訪精研，持之有故。著有《安吳四種》、《藝舟雙楫》六卷、《小倦遊閣文集》、《管情三義》七卷等書。

¹⁸阮元字伯元、雲臺、諡文達、自號頤性老人，江蘇儀徵人。乾隆甲申--道光乙酉，乾隆己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任少詹事、內閣學士、戶、禮、兵、工諸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兩湖、兩廣、雲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先生主持風會五十餘年，士林尊為泰山北斗。所輯《皇清經解》為言漢學者之總匯。著有《鞏經室全集》五十八卷、《論語論仁篇》一卷、《孟子論仁篇》一卷、《十三經注疏并釋文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經籍纂詁》二百十六卷、《國朝儒林文苑傳》四卷等數十種，可謂著作等身。

¹⁹劉逢祿字申受、申甫、思誤居士，江蘇武進人。乾隆丙申--道光己丑，嘉慶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禮部主事。先生為莊氏之甥，外祖莊存與賞其早慧，長聞從舅莊述祖先生緒論，盡得其外家之學，於《春秋》獨發神悟。著有《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卷、《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一卷、《左氏春秋考證》二卷、《劉禮部集》十二卷、《議禮決獄》四卷、《春秋論上下篇》、《論語述何》二卷、《發墨守評》一卷、《箴膏肓評》一卷、《穀梁廢疾申何》二卷等數十種。

²⁰沈欽韓字文起、小宛，江蘇吳縣人。乾隆乙未--道光辛卯，嘉慶丁卯舉人，選授寧國縣訓導。著有《春秋左傳補注》十二卷、《春秋左傳考異》十卷、《左傳地名補注》十二卷、《兩漢書疏證》七十四卷、《三國志補注》十六卷、《水經注疏證》四十卷、《幼學堂文稿》八卷、《幼學堂詩集》十七卷、《韓昌黎集補注》、《王荊公遂補注》、《蘇詩查正補注》等書。

書》，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收藏一套，總共十二冊。一至四冊為《四書典故覈》嘉慶戊辰年刊版、三至七冊為《春秋公羊禮疏》嘉慶己卯夏刊版、第八冊為嘉慶己卯年刊《春秋公羊禮說》與道光辛巳夏刊《春秋公羊問答》合為一冊、九至十一冊為《春秋繁露注》。第十二冊為《禮論略鈔》。

又據北京中華書局《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古籍普查記載，大陸地區現存《蜚雲閣叢書》計有十八部，分別收藏於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北京師大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華東師大圖書館、上海圖書出版社圖書館、遼寧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蘇州圖書館、安徽圖書館、浙江圖書館、杭州大學圖書館、福建師大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四川圖書館等十八所圖書館。如加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館藏《蜚雲閣叢書》，總計現存《蜚雲閣叢書》為十九部。

至於凌曉樓的其他著作，還有《群書答問》有木犀軒叢書本、《禮說》有《皇清經解》本、《儀禮禮服通釋》有木犀軒叢書本與叢書集成續編本。從目錄資料的統計上，凌曉樓著作應該有《四書典故覈》、《春秋公羊禮疏》、《春秋公羊禮說》、《春秋公羊問答》、《春秋繁露注》、《禮論略鈔》、《群書答問》、《禮說》、《儀禮禮服通釋》等九種，其中據桂文燦《經學博采錄》記載，調曉樓因讀〈喪服〉而作《禮論》百篇，後與阮元商榷，刪定為三十九篇，更名為《禮說》一卷，與《公羊禮說》並刊入《皇清經解》。今考察《皇清經解》本《禮說》與《蜚雲閣凌氏叢書》本之《禮論略鈔》，可以發現二書雖有繁、略之別，但原為一本。又發現桂氏記載與事實相反，《禮說》四卷計七十三條，經刪減後為《禮論略鈔》三十九條。

曉樓於道光六年作〈禮論略鈔序〉，已明言將《禮論》原書百篇寄呈阮元，經阮元刪改後刻入《皇清經解》易名為《禮說》，知《禮說》與《禮論》原為同一書。其後曉樓因病，其友毛生甫、陳受笙集資刊刻最後的定本，即《禮論略鈔》三十九條，所以《禮論略鈔》是最後刪定本。如此，凌曉樓著作應為八種，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庫又收藏有凌曉樓《蜚英閣經說》--凌曉樓手稿本，為各家目錄資料所不載、坊間亦無此書，其內容則為凌曉樓閱讀群經所作的筆記，總計含《左傳》、《詩經》、《禮記》等八十一則。又據大陸古籍普查的資料，北京中華書局《中國叢書綜錄》記載，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有凌曉樓《蜚英閣叢稿》手稿本三卷，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其中的二卷，分別是《蜚英閣史論》、《蜚英閣文集》。北京大學圖書館所缺的《蜚英閣經解》一卷，疑即台北傅斯年圖書館所收藏的《蜚英閣經說》。除去《禮論略鈔》與《禮說》為同一種著作，增加未刊行的《蜚英閣叢稿》手稿三種，合計凌曉樓著作總數仍為九種。

除了凌曉樓本身的九種著作的整理研讀之外，同時期學者的經學著作、文集，對深入掌握凌曉樓學術有一定的幫助。尤其凌曉樓曾經問學於包世臣、劉逢祿、沈欽韓、孫星衍等人。凌曉樓弟子劉文淇與陳立直接受其影響，他們的言行、著作，當然都有凌曉樓學行之痕跡可尋。凡此，皆有助於更深入瞭解凌曉樓之生平事跡與學術思想。

貳、論凌曉樓先生之學術特色

一、漸為西京之學

凌曉樓學術的次第，以張惠言之《四子書漢說》為階梯，而窮究《四書》之典章、名物。尤其引《三禮》、《春秋》以明《四書》之禮制，以經解經駁斥學者之憑空臆說。又由《四書》進而精研《三禮》，以鄭玄《儀禮注》為裁斷諸說之的，著《禮論略鈔》、《儀禮禮服通釋》。同時著《春秋繁露注》以通《春秋》，以董仲舒《春秋繁露》為《公羊傳》之真傳，成《公羊禮疏》、《公羊問答》、《公羊禮說》以成一家之言。凌曉樓之《公羊》學，不以辨章義理為務。然透過禮制之考求，而孔子微言大意自明於前。

乾、嘉之學風，以考據、訓詁相勝，所以有「人人賈、馬，家家許、鄭」之說。凌曉樓承繼此風，又推而復古為西京之學。所謂西京之學，即與東漢古文之學相對而言。關於兩漢經學發展，凌曉樓在《群書答問》第九十八條〈問《白虎通》之作〉中有所敘述，凌曉樓云：

方諸儒承制，會白虎觀講議五經異同，于時成封、桓郁、丁鴻習《歐陽尚書》，魯恭、魏應習《魯詩》，李育習《公羊春秋》，樓望習《嚴氏春秋》。故書中《春秋》多引今文，而間及《左》、《穀》。《書》則今文，而于古文則略備一說。《詩》則魯、韓並列而兼收《毛故》焉。

是章帝之時白虎觀議經以今文為主，而古文經則略備而已。曉樓以為《白虎通》雖然師說不一，但引述經說大端尚在，故常常稱引《白虎通》之說以申明經義。其以今文學觀點釋經的精神，受劉逢祿影響。

凌曉樓曾經先後問治學之法於包世臣、問《四書》之學於李兆洛、問何休《公羊》之學於劉逢祿，又曾問鄭氏《禮》於沈欽韓。凌曉樓繼承了劉逢祿《春秋公羊何氏釋例》的主要觀點，卻與沈欽韓以說《春秋》專以《左氏》為主的學說大相逕庭。此為清代學術中今文、古文師法不同的痕跡。所以凌曉樓卒後，劉文淇於〈與沈小宛先生書〉中特別請求沈欽韓為凌曉樓《公羊禮疏》作序，劉文淇曰：

先舅氏曉樓先生所著書，最精者莫如《公羊禮疏》，誠如來教所云，但此書博引舊說，無所引申，恐後人有襲取之者。極知先生不喜《公羊》。然舅氏一生勤學，非先生孰表章之？倘能賜序一篇，幸甚。

沈欽韓始終不曾為凌曉樓《公羊禮疏》作序，並說：

尊舅為劉逢祿輩所誤，溺於《公羊》。獨足下餘波不染，誠為卓犖。

沈欽韓之不肯為凌曉樓作序，恐怕也是對於今文學與古文學間的隔閡無法去除之故。凌曉樓〈公羊禮疏自序〉已云：

先儒謂事莫詳於《左氏》，義莫精於《公羊》。

《春秋》乃明義之書，非紀事之書也。若云紀事，一良史之才已足，何至游、夏之徒一辭莫贊？將謂《春秋》非事實不明，孔子不能逆料邱明為之作《傳》。世無《左傳》而聖經因之而晦乎？似非通論也。《春秋》固無《傳》而明者也。孔子假當日之行事而王法寄焉爾，其事實不足繫有無之數也，故《公羊》略之。

充分說明「發揮《春秋經》義」為曉樓《公羊》學的基本觀念。《公羊》為今文之學，凌曉樓又以董仲舒《春秋繁露》為《公羊》學再傳的唯一典籍，故考述《春秋繁露》的內容，逐一注疏，建立凌曉樓《公羊》學說的基礎。

凌曉樓以漢儒舊疏考據典章制度的方式、與清儒考訂文字音義辨真偽的工夫，結合其疏明《春秋》微言大意的說經態度，在乾、嘉學術逐漸開創新局面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影響與價值。

二、「禮者治人之律，而春秋則其例也」--援禮釋《公羊》、引《公羊》以證禮

凌曉樓既作《春秋繁露注》，復作《公羊禮疏》、《公羊禮說》、《公羊問答》，以禮為綱紀，建立「禮為治人之律，《春秋》則為其例」²¹的說經新觀點。此一論點，劉逢祿於其〈《春秋公羊》禮議自序〉中已經提出。劉逢祿引述董仲舒之言，以《春秋》為禮義之大宗。又云「子游、子思、孟子三賢莫不以禮說《春秋》」。但劉逢祿以明何休《解詁》之體例為學說重心，以禮說《春秋》一脈則由凌曉樓為其大宗。經整理凌曉樓有關《公羊》學的四部著作，即《春秋繁露注》、《公羊禮疏》、《公羊禮說》、《公羊問答》，不難發現曉樓援禮以釋《公羊》實為曉樓《公羊》學之核心。在《公羊禮疏》中關於疏明禮制的部分，疏明吉禮者有四十二條、疏明凶禮者有三十九條、疏明軍禮者有七條、疏明賓禮者有九條、疏明嘉禮者有十三條，佔《公羊禮疏》全書四百三十五條中的一百一十條。而《公羊禮說》全書三十

²¹凌曉樓〈四書典故嚴自敘〉：「《禮》者治人之律；而《春秋》則其例也。《春秋》之旨，僅存于《公羊》。」

篇，完全從禮的觀點來發揮《公羊》大義，並且駁斥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因不明禮而誤說者。《公羊問答》全書一百一十五條，亦著重於禮制探討等問題。

曉樓《公羊》學援禮以說《公羊》，而其禮學與《四書》等群經之學，又引《公羊》以證禮。在《禮論略鈔》中，曉樓多次引用《公羊傳》以論述歷代禮制違失之處，並據《公羊傳》以駁斥學者之說。而於《四書典故覈》更舉時《春秋》以為附證，對於考據禮制典章而言，可謂相得益彰。

三、強調《白虎通》《風俗通》《列女傳》《淮南子》等典籍的參考價值

曉樓《公羊禮疏》引用《白虎通》以疏明禮制者，計有八十一條之多，更於《群書答問》第九十八條述明《白虎通》在今文經學上的價值。曉樓認為白虎觀議經之時去古未遠，當時漢儒之家法雖失，《白虎通》所紀錄諸家辨說經意的內容，猶大有可觀。其中以今文經學為主軸，可得徵驗者十得五、六。所以欲明漢儒今文經學之意蘊，不可不明《白虎通》之說。

曉樓此一觀點為弟子陳立所承繼，陳立除了完成《公羊義疏》七十六卷，成為清代今文《公羊》學集大成的著作之外，又完成《白虎通疏證》十二卷以完備師說。

除了大量引述《白虎通》以疏證典章禮制外，曉樓對於其他漢代的典籍資料，亦多所採納。如劉向《列女傳》、應劭《風俗通》、劉安《淮南子》等典籍，都在引證之列，這是曉樓在資料處理方式上的一大進步。展現由專精之學邁向宏觀之路的一種轉變。突破乾、嘉學者矻矻於文字、聲韻、訓詁的學術窠臼。

四、以《經》、《注》、《疏》、博證群書的態度說經

曉樓畢生以刻書、授書為業，刊行的經學著作文字計有五十餘萬言。察其著述之方式，曉樓自言乃「辨難處少，援引處多」，這是遙承孔子「述而不作」的著述態度。曉樓辨章禮制之源流、變革，卻從不斷以己見。

其《群書答問》第九十條答〈問朝貢之制〉中曾說「凡《經》之未明者，求之於〈注〉、〈注〉之未明者，求之於〈疏〉、〈疏〉有未明者，當廣引他書以證明之。如仍未詳，闕疑可也。此為說《經》者之態度。」曉樓徹底實踐此一說經之態度，同時反映於經學著作之中，不論考據名物、述明禮制或發揮義理，從不妄發一語。凡所著述，皆言而有據，所以包世臣論曰「凡君所著書三十八卷，五十餘萬言，皆有顯證，遠雷同附會之陋，足為來學者

先路。²²」包世臣所稱「皆有顯證」，可以作為曉樓經學論述的最佳註腳，而「以經解經」則是曉樓心目中最理想的說經方式。

由「以經解經」不得已而引《注》以解經、又擴而引《疏》以解經，其中引證歷史故實與歷代禮俗以比附經義，又為述明經學開啟更新的視野。

五、純儒家經師的角色認定

包世臣〈清故國子監生凌君墓表〉言曉樓一生「獨尚樸學，南北奔坎，皆以校書授書為事，未嘗與斯世通。羔雁脩脯而外，未嘗入可以無取之財。予每過從君，必危坐據案、左手繙卷冊、右手持筆，客至前而不見。蓋自締交以來廿餘年如一日，君得於天者後汪君，而人力堅緻始終不渝，則殆過之。」包世臣將曉樓與汪中的學風作了比較，以為曉樓堅忍勤學之力，勝過汪中。張舜徽《清儒學記·揚州學記》關於劉文淇學術淵源，溯源於曉樓，又述曉樓事蹟，曰：

凌曙是一位拔起孤寒、艱苦自立的學者。深知寒士讀書之不易，特別憐愛他的外甥劉文淇，在生活和學習上給以許多照顧，並親自教導不使廢學。這對劉文淇一生成就，資助很大。於是凌曙努力奮發的精神和終身以校書、授書為事的職業，都為劉文淇繼承了。

劉文淇繼承了曉樓一生奮發勤學，與校書、授書為事的儒家式安身立命之道。此外在學術旨趣上，曉樓以今文經的《公羊》之學為治經目標，而劉文淇則以古文經學中的《春秋左氏傳》研究方向，加上曉樓另一位傑出的弟子陳立亦以《公羊義疏》著名於世。形成曉樓弟子集西漢今文經學的《公羊傳》、與東漢古文經學的《左氏傳》粹於一門的特殊現象。

曉樓〈禮論略鈔後序〉自言於困苦之時，乃「復以所入盡刊所著」。朋友曾勸他「金帛甚難得，五旬以外惟此幼，家無餘糧，他日竟何恃？」雖然如此，曉樓在病中猶以「身後之文誰為論定」為念。對於畢生著作有所堅持，曉樓云：

雖所撰著不足覆醬瓿，或少有留貽，即滋後人訕笑，不猶愈於湮沒草莽，忽與萬物同化。聊因以生甫所定者，刻為一卷，名曰《禮論略鈔》。後有餘資，當留為兒子衣食，不敢負受筴苦口也。²³

充分表現曉樓「君子憂道不憂貧」的人生觀。不論從曉樓一生事跡或學術著作上看，曉樓都

²²包世臣《藝舟雙楫》〈清故國子監生凌君墓表〉。

²³據凌曉樓〈禮論略鈔後序〉。道光六年丙午（1826年）曉樓五十二歲，家居閉戶著述、授徒。刪定《禮論》為《禮論略鈔》三十九篇。曉樓作〈禮論略鈔後序〉，題「道光六年二月廿日，江都凌曙書于蜚雲閣中。」

是一個純粹的儒家經師。以《春秋公羊》學、《三禮》、《四書》等群經的論述為畢生志業，除羔雁脩脯而外，未嘗入可以無取之財。曉樓不止在說經的態度上繼承了傳統儒家的精神，並且在立身處世上也具體實踐了原始儒家的信念。

參、本文結論

張舜徽《清儒學記·揚州學記》的結論中，歸納出六點揚州學派的優良學風；分別是一、對待學術問題，採取求同存異的態度。二、運用變化、發展的觀點分析事物。三、推廣了求知的領域。四、突破了傳、注重圍。五、不從事聲氣標榜。六、肯承認自己短處。並總論揚州學派學者的治學態度與其學術之成就，以「圓通廣大」四字為評論。

本文藉張氏所言揚州學派的六點優良學風，作為探討曉樓學術特色之結論。首先從求同存異的學術態度來看，曉樓所有經學論述都遵循「闕疑」之義。對於學者說經的意見雖有所去取，終以列述眾說以呈現不同的釋經意見為著述方式。所以對於「禘」的考據，在劉逢祿〈禘義〉的基礎上，釐清典籍之中三種不同含意的禘之祭。即以禘、袷連言者為宗廟之殷祭；而以禘、嘗連言者為四時之享祭；以禘、郊者為天子祭天之禮。而於井田之制，則考證《周禮》與《孟子》之說相違而並存其說。求同存異以引據諸家學說，又強調「闕疑」之義，此為曉樓治經、說經的一貫態度。

其次在運用變化、發展等觀點分析事物的方法上，曉樓大量引述《白虎通》與漢、唐以來之朝議以驗禮之沿革，或述明禮制之典故淵源；或指陳漢、唐諸議之失禮，皆以變化、發展的觀點來檢驗典章、禮制。至於回歸《春秋》微言大義的精神，其關於「為漢制法」、「西狩獲麟」等解疏，亦以此觀點分析孔子《春秋》實以經義為主而非以史實為主。

又關於推廣求知領域的部分，曉樓畢生謹守以經為師的為學態度與方法，在三十歲以前自學以成名。雖難免於孤陋之蔽，卻也無形之中擺脫了師法的限制。其後受知於洪梧、阮元，又曾問學於包世臣、沈欽韓、李兆洛、劉逢祿等人，但以經為師的治學方法始終不渝。因此，曉樓所取材的範圍突破了乾、嘉漢學家所專注的箋釋、校勘等限制，而旁及子、史、西法等典籍。如《四書典故覈》第二卷〈日月星辰繫焉〉一文，從現代天文學的觀點，論述星球運行的軌跡，得出「星謂五緯、辰謂二十八宿」的結論，並且以二十八宿為紀日之所次，反駁邵雍以無星處為辰的說法。洪梧盛贊其〈日月星辰〉與〈天之高也〉二條，備採十三家說於西法，故能提出千古所未發之論。於此可以見出曉樓擴大說經的材料，同時推廣求知的領域。

而突破《傳》、《注》重圍一條，與曉樓以經為師的成學歷程相呼應。曉樓在《公羊禮疏》中自訂為「《疏》不破《注》」的疏經之體例，故而博綜學者之議論以注疏《公羊》，卻謹守何休之說，但已條述諸家不同意見。在《公羊禮說》與《公羊問答》之中，曉樓則大量補充何說不足之處、指斥徐彥《疏》謬誤之說。〈公羊禮疏自序一〉曰：「原夫《公羊》至

漢，始著竹帛。鄒、夾無傳；嚴、顏最盛。然是非不明，句讀亦失。於是任城何君，起而修之。探東國之微言，闡西河之至教。依經立注，厥功偉矣。觀其《解詁》，言禮亦詳。徐氏之《疏》，乃詳於例而略於禮，未能如孔、賈之該洽也。今取徐氏之《疏》而補疏之，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便徵他議……。」

〈公羊禮疏自序二〉又言：「大抵空言無補，惟實事求是，庶幾近之。而事之切實，無有過於禮者，舊疏嫌其闕略，故撰《公羊禮疏》十有一卷，正徐氏解禮之失；破諸儒持論之偏。引據經史，疏通而證明之。」

「事之切實，無有過於禮者」一言，也成為曉樓學術之主軸。此外，曉樓說《三禮》以鄭玄之說為裁判，但於鄭玄疏略之處，則直指其非。曉樓完全以經之是非為主，實事求是而不被經師舊說所限制，故能突破傳、注之重圍，更客觀的疏明經意。

至於不從事聲氣標榜，可以從曉樓立身處世之節操來觀察。包世臣的〈清故國子監生凌君墓表〉作了最生動的說明。包世臣稱讚曉樓的獨介性格曰「君獨尚樸學，南北奔坎，皆以校書授書為事，未嘗與斯世通。」既言未嘗與斯世通，當然說明曉樓畢生不尚聲名追求，也不從事聲氣標榜的俗儒行徑。這也是曉樓一生困窮於孤寒之中的主要原因，因無公卿巨公的大力推挽，所以曉樓學術雖稱江南經學大師，卻不廣為人知。雖前後受知於洪梧與阮元，也止於以學術相尚而已，不曾從事於向聲背實無益於學術的交遊。

最後以肯承認自己短處方面，曉樓的〈四書典故覈凡例〉曾自言「此書辨難處少，援據處多」，對於未針對義理發揮有所交代。而其〈公羊禮疏序〉中更說明自己的不足之處，曰：

僕以闢茸之資，無摩研編削之才、亦無游博持掩之好，唯篤嗜《公羊春秋》，覃精竭思、力索有年矣。然窮其枝葉，而未及宗原。是知執寸莛以撞鐘、爇一炬而爨鑊，其無益也明甚。不有賢哲，何足以知《春秋》？《管子》云：「老馬識途」。予雖駑駘，亦既為之前驅矣。士有志於《春秋》者，尚或覽焉而不致驚濤洋而悲歧道也夫。

曉樓自言才、學兩缺，既無摩研編削之才、亦無游博持掩之好，唯對《公羊春秋》經義有所偏愛，窮其枝葉而未及其宗原，雖是自謙之詞，卻可見出不掩己短與堅持學術的治學態度。

本文整理曉樓生平事蹟與學術觀點，以曉樓學術著作為基礎，論述曉樓的學術精神與內涵。最後所獲得的結論，肯定曉樓畢生治經的學術堅持，與其以純粹儒家經師角色自我期許的安身立命之道。在揚州學派學者之中，曉樓以經為師自學成名，並啟發兩大弟子劉文淇²⁴

²⁴劉文淇學術出於其舅氏凌曉樓，以「青谿舊屋」繼曉樓之「蜚雲閣」，成就傳經之風。張重威於1961年為江都梅鉞所撰《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作序，論乾、嘉晚期揚州經學興盛之狀，曰：「乾、嘉、道、咸之際，揚州經學之盛，自蘇、常外，東南郡邑無能比焉……揚州之學，師傳不失。凌、劉而後，乃有梅氏。恭甫、申叔兩先生，若睹斯記，當更喜如凌氏見「青谿舊屋」之能接「蜚雲閣」也，（凌曉樓先生所著說經文字六種，合刻為《蜚雲閣叢書》）一脈相承，淵源有

與陳立，成為唯一在《春秋》學領域中集西漢今文經學與東漢古文經學於一門的經學大師。雖然聲名不振，但並不損害其學術之價值；反而更加突顯曉樓畢生以經為師之治學精神，別具啟迪後學之價值。

自。」又尹炎武〈劉師培外傳〉論揚州學派之學術，以凌曙、劉文淇後出，承揚州學派治學之長；劉氏四世傳經之業，可以視為揚州學派萃取吳、皖兩派學術精義而得的整體表現，足與吳派惠氏、嘉定錢氏的經學傳家之風前後輝映。劉氏經學可以視為揚州學派集萃吳、皖學風而匯聚的代表學說。

參考書目

（一）凌曙著作

- 春秋繁露注十七卷 清·凌曙著 《蜚雲閣凌氏叢書》嘉慶二十年刊本
 春秋公羊禮疏十一卷 清·凌曙著 《蜚雲閣凌氏叢書》嘉慶二十四年刊本
 公羊問答二卷 清·凌曙著 《蜚雲閣凌氏叢書》道光刊本
 公羊禮說一卷 清·凌曙著 《蜚雲閣凌氏叢書》嘉慶二十四年刊本
 儀禮禮服通釋六卷 清·凌曙著 清道光間德化李氏木犀軒輯刊本
 禮說四卷 清·凌曙著 《皇清經解》學海堂庚申補刊本
 群書問答二卷補遺一卷 清·凌曙著 《木犀軒叢書》光緒十四年德化李氏刊本
 禮論一卷、即禮論略鈔 清·凌曙著 《蜚雲閣凌氏叢書》，道光六年刊本
 四書典故核八卷 清·凌曙著 《蜚雲閣凌氏叢書》，嘉慶十三年刊本
 蜚雲閣經說 清·凌曙手稿本 台北傳斯年圖書館館藏善本書

（二）期刊論文

- 清代經今古文學的傳承 湯志鈞 中山大學《第二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灣學者研究「清乾嘉揚州學派」述略 楊晉龍《漢學研究通訊》第十九卷第四期 89.11
 清代乾嘉揚州學派經學研究的成果與貢獻 賴貴三《漢學研究通訊》第十九卷第四期
 大陸學者對清乾嘉揚州學派的研究 蔣秋華《漢學研究通訊》第十九卷第四期 89.11
 清代揚州學派研究展望 張壽安《漢學研究通訊》第十九卷第四期 89.11
 清儒會通傳統與現代化思想的「義利合一」觀 張麗珠《齊魯學刊》205 期 2008.4

（三）學位論文

- 凌曙公羊禮學研究 鄭卜五 國立高雄師大八十六年博士論文
 清代儒學系譜之建構——以江藩《漢學師承記》與《宋學淵源記》為範圍
 張秋香 國立政治大九十五年碩士論文
 劉師培《禮經舊說》研究 繆敦閔 暨南國際大學八十九年碩士論文

（四）專書著作

- 羊義疏 陳立著 台北商務印書館 71.5

- 公羊學引論 蔣慶 著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5.6
- 左海文集 陳壽祺著 藝文印書館皇清經解續編本
- 春秋史論集 張以仁著 聯經出版社 79.1
- 春秋辨例 戴君仁著 中華叢書編纂委員會 67.12
- 春秋繁露義證 清·蘇輿撰 北京中華書局 1992.12
- 句溪雜著 清·陳立著 中央研究院館藏
- 左海經辨 清·陳壽祺著 藝文印書館皇清經解本
- 幼學堂文稿 清·沈欽韓 廣雅書局叢書雜著 113 傅斯年圖書館線裝書館藏
- 吳學士詩文集 清·吳山尊著 揚州大學圖書館館藏光緒壬寅江寧藩署雕本
- 阮元年譜 清·張鑑等撰中華書局年譜叢刊 1995.11
- 念樓集 清·劉寶楠著 文海出版社
- 青谿舊屋文集 清·劉文淇 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館藏光緒九年刊本
- 思適齋文集十八卷 清·顧廣圻著 南京圖書館館藏道光二十九年上海徐氏刻本
- 碑傳集 清·錢儀吉纂 中華書局 1993.4
- 經學博采錄 清·桂文燦著 台北明文書局 81.8
- 經學源流考 清·甘鵬雲著 台北維新書局 57.1
- 鄭堂讀書記 清·周中孚著台灣商務印書館 67.8
- 養一齋文集 清·李申耆著揚州大學圖書館古籍部館藏光緒
- 戊寅年刊本
- 養一齋詩文集二十五卷 李兆洛 傅斯年圖書館線裝書館藏
- 雕菰集 清·焦循著 鼎文書局 66.9
- 藝舟雙楫 清·包世臣著台灣商務印書館 75.11
- 擘經室集 清·阮元著 世界書局中國學術名著 71.3
- 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 梅鉞著 玉夔龍館油印本 1962
- 清代通史 蕭一山著 中華書局 1980
- 清代揚州學記 張舜徽著 齊魯出版社 1988
- 清代學者象傳合集 葉衍蘭、葉恭綽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7
-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支偉成著 岳麓書社 1986.3
- 清包慎伯先生世臣年譜 胡韞玉著 台北商務印書館 75.6
- 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譜 蔣彤編 台灣商務書局 1981.11
- 清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譜 蔣彤編 台北商務印書館 70.11
- 清劉楚楨先生寶楠年譜 劉文興編 台北商務印書館 75.6
- 清顧千里先生廣圻年譜 汪宗衍撰 台北商務印書館 70.12

儀徵劉孟瞻年譜	日.小澤文四郎著	大華印書館	28.4
劉申叔先生遺書	劉師培著	大新書局	25
清儒學案新編	楊向奎著	山東齊魯書社	1988.6
清儒學案	徐世昌著	台北世界書局	68
清儒學案小識	徐世昌纂	明文書局清代傳記叢刊本	
清學案小識	唐鑑撰輯	台北商務印書館	64.8
揚州研究	馮爾康等著	聯經出版社	85.8
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 張壽安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83			
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	張壽安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2005.12
清代的義理學轉型	張麗珠	里仁書局	2006 年 12 月